

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 结构抑或建构

——基于 2006CGSS 的实证分析

陆益龙

内容提要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检视了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意识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近 30%的人尚无阶级认知,64%的居民具有农民阶级意识,45%的人具有阶级冲突意识,2.3%的人有阶级行动意识;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意识具有“中层以下”的阶层认同特征。研究显示较低层次的阶级意识主要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地位特征的反映,高意识水平则主要是在某些实践经历中建构起来的,而阶层地位认同更多的是结构性特征反映。

关键词 乡村居民 阶级意识 阶层认同 结构 建构

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100872

阶级和阶级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视角,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快速变迁,这些特色经验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素材。因此,我们认为在对转型中国社会的分层与不平等研究中,如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验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对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发展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当前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社会学研究,较多关注于城市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边燕杰,2002),而其间对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问题尤为受到关注(张宛丽,2001,周晓虹,2005;李路

路,2008)。虽有一些研究也根据农村经验来探讨分层机制中的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倪志伟,2002),但他们分析的焦点和依据乃倾向于诸如收入和职业等客观阶层地位,而较少探讨乡村社会主体的主观阶级阶层意识及认同问题。

尽管目前的“三农”问题研究也非常关心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和农村社会不平等问题,而且对不平等可能潜伏农民阶级的集体行动或革命的风险似乎较为担忧(O'Brien,2002;O'Brien & Liangjia Li,2006;于建嵘,2003),但这些忧虑通常只是在一些农村矛盾或纠纷个案的触动下而产生的,它是否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则有待于更为精确经验验证。本文的研

2006CGSS 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的 211 和 985 二期项目,边燕杰教授和李路路教授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刘精明教授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CGSS 学术团队的同仁们为调查和数据整理付出了辛苦的劳动,刘精明教授还对初稿提出了极其有益的修改意见,谨此向他们致以诚挚感谢!

究正是要通过经验数据的分析,来揭示乡村社会主体关于不平等的主观意识,以及这些意识是否与阶级阶层结构存在某种联系,是否引导了有组织的行动。这一侧重于农村阶级阶层意识的经验研究,对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关于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理论,对拓展“三农”问题研究的视角,将可能具有积极意义。

一、理论回顾和假设

阶级意识 任何复杂的社会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分化与不平等,但社会中的不同层级群体的人们对不平等或地位差别的主观认识、评价和推测会存有较大差异。对于农民来说,阶级可能是一个较为模糊的、远离现实的抽象观念。然而,对于经历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农民来说,已经接受了长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或多或少对阶级及其在现实背景中的意义有所了解。当他们在对社会不平等进行阶级判断以及对自己作阶级认同时,客观现实和自己所理解的阶级观念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主观意识活动。

不过,在农民的阶级意识问题上,马克思曾持否定的观点,他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的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马克思,1972:152)但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所论述的阶级意识,与经验实际中的人们对生活状况的认识和评价是有差异的,而与历史上的阶级行动有着内在联系。不过卢卡奇认为,对阶级意识的研究也有两个与经验相关的问题:一是不同阶级的意识与他们经济和社会的总体状况之间的关系;二是阶级意识与人们关于生活状况的实际心理或思想的关系,以及阶级意识的实践功能是什么(卢卡奇,2004:107)。

尽管作为总体的阶级意识不同于个人思想,但它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个人对社会现实的主观性反映及个人的实践经验。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阶级意识及其水平是可以通过个体的态度和经验选择来加以测量的。赖特(E.O. Wright)就将阶级意识视为含有阶

级内涵的多种元素,所谓阶级内涵,一是指“阶级分析中意识方面的逻辑根源”,二是与“阶级相关的影响”,即对个人在阶级关系结构中的行动以及关系本身的影响(赖特,1996:254-82)。赖特根据意识包含的主观性三个维度:认识、推测和偏好,建立了阶级政策的历史模式、个人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的三维因果模型。通过对阶级的相互竞争定义的判别分析,赖特运用了一组态度量表尝试着测量阶级意识的水平,并将这一社会学方法付诸于对瑞典和美国的阶级意识的经验调查之中。经验调查结果显示,瑞典与美国的阶级意识的总体结构存在差异,在瑞典,阶级具有更为显著和更大的意识形态特征,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两国政党和工会采取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在美国政党和工会有意无意地削弱工人阶级意识的行动。而一些关于欧美社会阶级的经验研究,也是偏重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之间的关联(徐嘉猷,1994)。

对于汤普森来说,阶级是从历史角度所看到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一种东西,因而他极其反对用社会学的方法论去理解和研究阶级及阶级冲突问题。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样,汤普森确实对社会学的方法没有足够的理解,而只是站在历史学的立场,用阶级理论来概括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汤普森,2001:1-6)。事实上,在任何时期,人们不可能对社会不平等的现实是无动于衷的,不论人们是否组织起来或是否采取行动,至少都会对自己的地位有所认识和评价,而且这些主观因素也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关系和行动,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要将抽象的阶级意识具体化为社会现实及现实中的意识。因此,否定社会学对与阶级意识相关社会现实的经验研究的价值,可能属于一种学科偏见。

在一些经验研究中,研究者通常用类似“左-右翼”这样的潜类模型(latent class model)来测量和分析人们关于社会不平等或阶级的主观意识类型和水平,维克列姆(D. Weakliem)则结合帕金、曼海姆和吉登斯所论述的意识水平理论,将阶级意识的测量转换为意识水平的三类别测量。通过在问卷中设置“您是否认为自己属于一个阶级”、“如果是,您认为自己属于工人、中间还是其它阶级”、“如果非要让您选择,您选择工人阶级还是中间阶级”、“您是否认为工会权力太大”等问题,维克列姆把工人阶级意识分为三个潜类:无阶级认知(the unaware)、有阶级认知(the class-aware)和阶级意识(the class-conscious)。

(Weakleim, 1993)。

由于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下称 2006CGSS）的农村调查问卷包含了类似阶级意识水平测量的问题，而且还包含了农民关于阶级阶层冲突以及阶级行动倾向方面的问题。因此，2006CGSS 的数据能够支持对农民阶级意识水平的测量。由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假设：

假设 1：农民的阶级意识水平：作为乡村社会的主体，农民在社会经济地位和利益方面有较高相似性，在结构上具有一个阶级的特征，但他们的阶级意识水平存在着差异，表现为无阶级认知、农民阶级意识、阶级冲突意识和阶级行动意识四个层次。农民的实际社会经济地位，如财产、收入、经济活动、政治身份和教育水平等，可能是影响阶级意识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

阶层认同 阶层是社会分层理论中的一个概念，主要指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层级划分，阶层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阶层位置的主观评断。阶层认同反映的是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认识和评价，从这些主观认识和评价中，可以分析出人们关于社会不平等的观念和意识与社会现实存在何种联系。因为，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现实环境之中，他们的观念和意识不过是这一环境中的各种现实的综合反映而已。正如边燕杰、卢汉龙认为：“阶级认同是个人对经济资源的占有以及对他人劳动的支配的主观反映。”而阶级概念在中国有较浓厚意识形态色彩，因而也常被人曲解，因此，用地位观或层级认同可能会更好揭示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反映（边燕杰、卢汉龙，2002:509）。

那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地位观呢，边燕杰和卢汉龙在对上海市民地位观的考察中，提出了社会精英假设和工作单位差异假设。认为在中国社会，拥有控制公有财产和劳动力的权力精英不仅是“政党国家再分配功能的代理人，也是控制功能的代理人。”权力精英群体相对于非精英群体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一现实状况也会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得以反映。此外在中国，文凭或拥有高学历者不一定需要政治资本也可以进入专业化精英群体，但与管理者精英群体相比，专业化精英群体的地位观要低，因为一些管理者精英通过在职学习机会也能获得提升所需的文凭学历（边燕杰、卢汉龙，2002:510-15）。而且，有些管理者精英还可利用政治资本和控制的资源来变相交换文凭学历。地位观的单位差异根

源于再分配体制的分割经济，在经济分割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单位影响到个人的机会结构，个人所在单位的地位影响着他们在社会经济分层结构中升降幅度和范围，从而也影响着他们对阶层地位的主观意识。对 1991 年的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精英理论和分割经济理论的两种理论假设，由此说明计划经济体制已造成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固定认识，这种地位观是由特定的官僚系统和工作单位为核心的社会分层模式所造就的。也就是说，人们的阶层认同会继续固有的权威及利益分配结构的作用，而变动并非是主流。

在社会主义的分层机制与不平等研究方面，泽林尼（I. Szelenyi）提出的再分配理论认为，国家社会主义背景下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主要是由再分配中的权力和特权造成的，如果经济系统中的自由交易机会即市场成分增多，将对缩小再分配特权阶层与劳动阶层之间的差别以及缓解社会不平等有积极的作用（Szelenyi, 1983）。沿着这一理论逻辑，倪志伟（V. Nee）根据对改革开放后福建农村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认为市场化改革后农民家庭的收入大幅增长，为城乡差距的缩小提供了新的机制，中国乡村社会的分层机制正从再分配向市场转型，这一经验发现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泽林尼的理论（倪志伟，2002）。然而中国社会现实经验其实与泽林尼和倪志伟的理论并不完全相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乡村社会的收入水平确实大大提高，但城乡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程度一直在惊人地扩大和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虽从 1985 年 398 元增长到 2006 年的 3587 元，但城乡收入差距从 1985 年的 1.86 倍扩大到 2006 年的 3.28 倍，城乡收入增长指数同为 671（1978=100）（国家统计局，2007）。由这一事实来看，市场转型确实使增长能力大大提高了，但对削减社会不平等并没有正向作用。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也就需要从再分配与市场机制相互结合及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去寻找解释。无论如何，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分层模式或多或少会在乡村居民对阶层地位的主观认同中有所体现。

关于中国社会的分层问题，一些研究较为注重具体的阶层划分及阶层间的差别（李春玲，2005）。刘精明、李路路曾运用潜类模型法，通过对 2003CGSS 的数据分析，认为目前城镇社会存在“阶层化”现象，实证结果表明，在居住空间、社会交往和阶层认同三个维度上，5 个阶层潜类与客观阶层位置之间都具有

一致性和明显的对应关系(刘精明、李路路,2005)。也就是说,人们对阶层的主观观念与客观阶层地位有着一定关联。而有些研究则更为强调客观阶层结构对阶层认同的决定作用,他们在对经验数据的分析中发现,个人收入、职业地位、政治面貌和教育程度以及父辈阶层地位对个人的阶层认同有显著一致性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这一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提出的“中层以上”认同论,这一理论认为,由于城镇居民在改革开放后实际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多数人在阶层归属感上趋于“中层以上”(李强,2000)。

在城乡二元和城乡差别的现实背景下,乡村居民的实际阶层地位明显有别于城镇居民。如果将整个社会的阶层层级分为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五个层次,那么多数农村居民的阶层位置属于中层以下。如果说客观阶层位置决定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那么这一现实就会在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中得以表现,从而出现多数人将有“中层以下”的认同。据此我们可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2: 乡村居民的“中层以下”阶层认同: 乡村居民在农村市场化改革后的总体生活水平虽大大提高,但在城乡差别持续的格局下,他们的阶层位置依然较低,这一客观现实会使多数农民将自己认同为“中层以下”阶层。收入水平、财富价值、受教育水平、职业以及户口性质等结构性因素会强化农民的中层以下阶层认同意识,以及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意识。

结构与建构 农村改革以来,农民的经济与生活已经发生巨大变迁,乡村社会的阶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随着个人及家庭生产模式、财产状况、收入水平、政治地位、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变化,农民的阶级阶层观念将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些社会经济及个人因素究竟对农民的阶级阶层认同观念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以及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认为,“没有某种形式的阶级结构,就绝对不会产生与该结构所代表的那群人相关的阶级意识。”(李培林等,2005: 111)但结构和认同意识是否必然导致阶级行动,则是未知的。这一点与赖特所说的阶级意识的总体模式是由阶级关系结构塑造的观点具有一致性。

然而,R. Aron 在诠释马克思阶级理论时提出:“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时才真正存在,但若不承认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有阶级意识。一个阶级只有当它发现它要对其他阶级进行斗争的时候,它

才具有自我意识”(阿隆,2003:17)。由此来看,在阶级阶层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关于结构、意识和行动三个维度关系的分歧。人们的主观阶级阶层意识究竟是由结构决定的还是在集体行动中建构起来的呢?阶级阶层内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是由集团意识导致的还是由阶级阶层的利益结构决定呢?回答这样几个问题对于阶级阶层意识研究来说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我们由此不仅了解现实中人们是怎样认识和评价阶级阶层关系的,以及如何对自己进行阶级阶层认同,而且我们从中亦可把握这些认同意识与客观结构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关系,这样也可预测和判断结构和意识是否具有潜在集体行动的风险。针对上述问题,在这里可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假设 3: 结构性和建构性因素共同影响着农民的阶级阶层意识。农民的阶级阶层认同与他们的社会经济条件的现实状况具有较高一致性和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农民关于自己阶级阶层地位的意识或观念,主要是他们客观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结构的反映。不过,在较高层次的阶级意识中,建构性的因素作用更为显著,即个人能动的、实践的经历对较高水平的阶级与不平等意识具有建构作用。

二、数据与测量

为检验上述研究假设,我们将用下面的数据来进行分析,本文用以分析的数据来自于 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CGSS),该调查采用了标准 PPS 抽样方法,并以问卷调查方式进行,其中农村问卷为独立部分。调查共取得有效样本 10151 个,其中农村样本为 4138 个,占 40.8%,本文分析限于农村样本。

阶级意识水平 为了测量农民的阶级意识水平,我们通过问卷中的四个问题形成四个虚拟变量,这四个问题分别是:“您是否认为我们社会有阶级之分?(Q1)”、“如果您选择(一定要选),您属于哪个阶级?(Q2)”、“您认为社会不同群体的冲突程度如何?(Q3)”、“在那些集体行动中,您是否担任过某种角色?(Q4)”。

根据问题 1(Q1) 我们可以测量出农民关于阶级的认知情况,即区分出“无阶级认知”和“有阶级认知”;用问题 1 和问题 2(Q2) 交叉,产生“有阶级认知”者与“农民阶级”认同者的交集,构成“农民阶级意识”二分变量(是=1) ;问题 3(Q3) 是由一个关于社会冲突的态度量表转换而成,量表平均分值为 2.5 代

表被访者认为社会冲突不严重或没有冲突,我们将问题3(Q3)的分值 ≥ 2.5 的与“有阶级认知”相交,产生代表“阶级冲突意识”的二分变量;问题4(Q4)是一个多选题,主要询问被访者是否参与过某些集体行动,以任何形式参与过集体行动,都视为有过集体行动经历,并将他们与“有阶级认知”者构成一个交集,产生“阶级行动意识”的二分变量。

对阶层认同意识的测量,是根据被访者对自己社会经济地位所属层次的判断而定,阶层认同变量由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构成的5级定序变量。对未作答皆以系统缺失值处理,表1是关于农村居民阶级阶层意识的测量问题和作答情况。

表1 农村居民的阶级阶层认同(2006CGSS)

问 题	作答	人数	%
1.我们社会是否有阶级之分?	有	2931	70.8
	没有	1207	29.2
2.如果让您选择(一定要选择),您属于哪个阶级?	农民阶级	3661	91.4
	工人阶级	251	6.3
	中产阶级	78	1.9
	企业家阶级	15	.4
	总计	4005	100.0
3.您认为(一定要选择)您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哪一层?	上层	12	.3
	中上层	80	2.0
	中层	925	22.8
	中下层	1112	27.5
	下层	1918	47.4
	总计	4047	100.0
N=4138			

结构性变量 结构性变量在这里主要用来反映个人在社会经济、政治及教育等方面的相对稳定的特征或地位,它主要包括区域和地域类型等地理位置、职业、收入水平、房产价值等经济地位;民族、户口、教育、宗教信仰等社会位置;以及职务、政治身份等政治地位。虽然教育、政治身份和宗教信仰包含主观因素的作用,但它们通常被用来反映个人社会特征的相对客观和稳定的变量。在结构性变量测量方面,地域类型、户口类型、职业类型、政治身份及民族身份分别为是否属平原地区、是否农业户口、是否从事农业、是否为普通百姓、是否汉族的1-0型二分变量;区域类型分为东(=1)、中(=2)和西部(=3);职务分为乡镇干部(=1)、村干部(=2)和无职务(=3);教育水平分为小学以下(=1)、初中(=2)和高中以上(=3);宗教信仰分为信仰三大宗教(=1)、信仰民间宗教(=2)和无宗教信仰(=3);收入和房产价值变量按照从最低20%到最高20%分成5个等级,形成两个由低到高分值为1-5的定序变量。

建构性变量 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模型对地位

及机会结构较为偏重,如帕金(F.Parkin)强调职业地位、收益体系在阶级结构中的核心作用(Parkin, 1971);古德索普(J. Goldthorpe)等人将个人的生活机会视为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并把它作为界定阶级的重要维度(Goldthorpe, 1987)。在阶级意识分析中,阶级模型存在着将结构与意识置于二元对立之中的局限。既然意识与行动或实践经历有关联,那么,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行动对意识的建构作用也就不容忽视。一些定性研究虽能揭示能动性对意识的建构过程(艾薇克、西尔贝, 2005),但至于能动性和主观建构究竟对意识形成产生多大作用,则往往难以把握。为此在阶级意识分析模型中引入建构性或与人经历相关的变量,就显得尤为重要。

建构性变量反映的是个人的、非系统性或偶然的以及实践性的经历。在模型中引入建构性的变量,旨在调和结构论所强调的存在、结构或系统性因素对意识形成的作用,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某些意识或观念可能是在某种实践或事件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本文运用的建构性变量主要包括农村居民是否有过非农业生产经历、是否有过外出经商活动、是否有过参军经历、是否有过担任村或乡镇干部的经历、是否拥有某项技术,以及在过去5年内是否有过不公待遇等7个1-0型二分变量(是=1,否=0)。这些变量对农民阶级阶层意识是否具有影响能说明个人的经历对意识的形成和活动是否有建构性作用。

控制变量 人们的观念和意识可能在年龄和性别之间有一定差异,因此,在阶级阶层意识模型中通常需要将这两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便更为准确地把握客观结构和主观建构变量的作用及影响机制。性别变量为虚拟变量(男性=1),年龄变量分为青年(<25岁=1)、中年(25-50岁=2)和老年(>50岁=3)三类。

三、研究发现

农民阶级认同为主的阶级意识 首先,为了考察假设1中提出的农民阶级意识水平问题,我们在上述测量方法的基础上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有29.2%的农村居民属于无阶级认知的群体,这一群体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可能有两种情形:一是不赞同用阶级差别来说明当前的不平等;二是对不平等的理解和意识较为模糊。64.0%的农村居民有明确的阶级认知,表明他们已感受到阶级的差别,或从阶级角度来理解社会不平等。有64.0%的人形成了与自己客观地

位结构相一致的“农民阶级”认同意识,这一结果说明,近 2/3 的农民具有了农民阶级意识,意味着当代农民并非仅为一个自在阶级,他们多数人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属群体的共同特征和共同利益。

根据阶级冲突意识量表的测量结果,农村居民的阶级冲突意识平均值为 2.53 (取值范围 1-4, 中性=2.5, 标准差为 0.44), 表明农村居民总体上偏向于有冲突的意识,即认为不同地位、阶层和群体之间有冲突倾向。再结合有阶级认知来分析,可以认为 44.9% 的农村居民的阶级意识水平发展到阶级冲突层次。也就是说,这部分人不仅认为阶级之间存在利益差别,而且也认为存在着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利益的不一致性。

在 4138 个有效样本中,有 345 个被访者报告在 5 年内身边发生过集体行动事件,其中有 250 人宣称从未以任何形式参与集体行动,95 人以不同角色参与或支持过集体行动,占总体的 2.3%。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意识是伴随阶级行动而形成并发展的。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在这里可将参与集体行动者理解为具有了行动意识。从这一结果来看,农村居民中具有阶级行动意识者属于极少数,集体行动的风险相对较小。

就目前农村居民的社会分层与不平等意识或观念而言,经验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自在阶级,多数农民已经意识到社会中存在具有地位相同、利益一致的农民阶级,并将自己归属于这一阶级,而且也有比例不小 (44.9%) 的人从冲突的视角去理解社会不平等。

“中层以下”的阶层认同 农村居民对自己所属阶层的认同与城镇居民的“中层以上”阶层认同形成鲜明的反差,绝大多数农村居民认为个人的社会阶层地位属于中层以下占 97.7%, 仅有 2.3% 的居民将自己认同为中上层及以上。而且属于下层认同的最多,达 47.4%,有 27.5% 的人认同中下层,由此形成了一种似“钟”形的阶层认同形态。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阶层认同形态结构上的反差,反映了中国城乡差别在人们主观意识中已得到充分体现。

在微观层面上,根据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与自己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的对应分析结果来看 (见图 1),“中下层以下”的认同与个人收入有着较高度度的对应关系,社会下层认同与收入为最低 20% 和 40% 者密切相连,认同为中下层者与中等收入水平有较密切的相关,而中层以上的阶层认同,与中下层以

下认同有显著差异,它与个人收入水平的关联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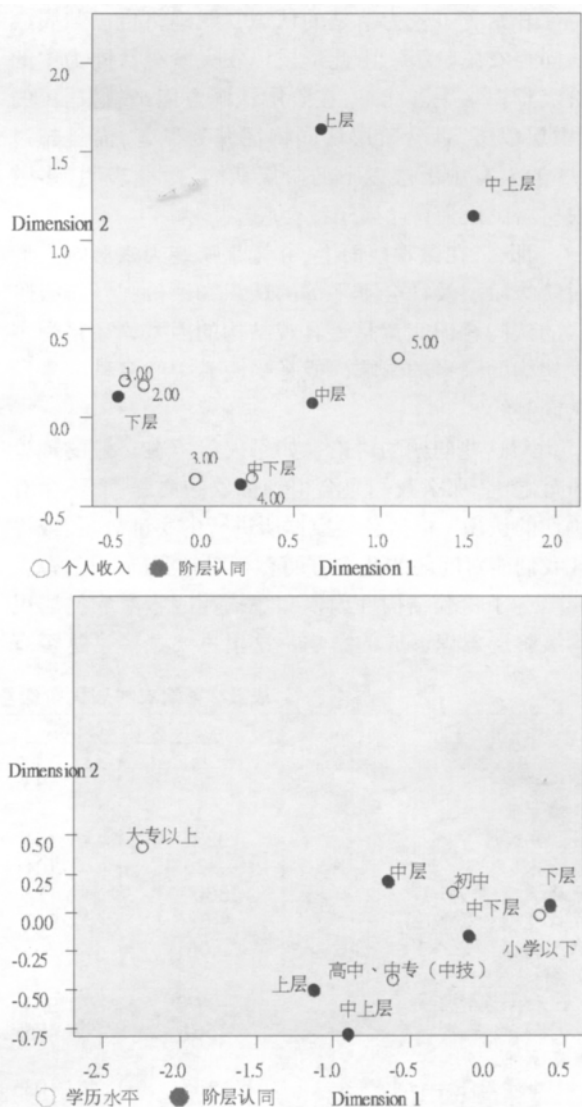


图 1 农村居民阶层认同与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对应分析

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与受教育水平的关联最突出地体现在社会下层认同之上,小学以下的受教育水平与其密切相连,中层及中下层认同与初中教育水平有较近距离,中上层以上认同与学历的距离较大,表明两者的对应性不强,同时说明那些将自己认同为中上层以上社会阶层的少数农村居民,并不一定具有较高的学历。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认同,可能是出于对其它特殊差异性因素的考虑。

阶级阶层意识中的结构与建构 上述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当前农村居民已经具有较为清晰的阶级阶层意识。在阶级意识方面,多数农民已经不仅是一个自在阶级,他们有着诸多共同的利益和

共同的社会经济特征,而且,他们对这些共同利益和特征开始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明确将自己归属或认同为农民阶级,由此形成以农民阶级认同为主的阶级意识水平。此外,在阶层认同方面,农村居民的“中层以下”社会阶层认同特征尤为显著,而且超过2/3的人有中下层以下的阶层认同,由此表明,多数农村居民认为自己属于社会底层。

那么,在微观层面上,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人们对阶级阶层及社会不平等的认识和评价呢?阶级阶层的认同意识究竟是受客观结构的因素,还是受主观建构的因素的影响,或是受两者中的多种因素所共同制约?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如果仅停留在一般的理论争辩之上,那么我们只会得到抽象的命题,而不会有确切的认识。根据经验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或许让我们能对问题的几个方面有相对较明确的把握。

为了检验结构性因素和建构性因素对农村居民阶级阶层意识形成的影响,这里主要选择了是否有

阶级认知、是否有农民阶级认同、是否有阶级行动三个阶级意识水平,以及阶层认同这样几个模型。通过这几个模型的回归分析,基本能反映不同层次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受结构性变量和建构性变量影响的具体情况。

表2是关于结构性变量与农村居民三种阶级意识之间关系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首先,从阶级认知意识模型来看,模型检验具有显著性,表明用结构性因素可以解释农村居民为何形成“有阶级”认知的意识。具体来看,区域类型、地域类型、政治身份、受教育水平、房产价值水平、民族和宗教信仰等因素,都对是否有阶级认知的概率产生显著作用。其中中部比东部地区、中东部比西部地区、平原比非平原地区、高中以上学历、普通百姓比有党派人士、房产价值中低以下比中等、少数民族比汉族、信仰正式宗教比信仰民间宗教、无宗教信仰比有宗教信仰者形成“有阶级”认知意识的概率显著提高。此外,阶级认知意识还受年龄和性别因素的影响,青年人比中年

表2 影响农村居民阶级意识的结构性因素(2006 CGSS)

	阶级认知模型		农民阶级意识模型		阶级行动意识模型	
	B	S.E.	B	S.E.	B	S.E.
常数项	.203	.533	-.481	.515	-14.257	17320.481
区域类型						
东部 v 中部	.333****	.106	.153	.104	-.034	.535
东、中部 v 西部	-.326***	.124	-.329***	.122	.282	.487
地域类型(平原=1)	.330****	.112	.413****	.110	-.254	.545
户口类型(农村=1)	-.286	.312	.198	.278	19.688	15410.297
职业类型(农业=1)	-.061	.263	-.079	.255	.439	.742
职务						
村 v 乡镇干部	-.672	.934	-.366	.945	-.863	1.183
村、乡干部 v 百姓	.561	.485	.266	.489		
教育水平						
小学以下 v 初中	.138	.103	.097	.102	.585	.436
初中以下 v 高中以上	.309*	.166	-.017	.153	.259	.611
政治身份(百姓=1)	.372**	.180	.467***	.173	1.640	1.081
收入(<6000元=1)	.162	.122	.251**	.118	-.438	.475
房产价值						
低	-.202	.134	-.151	.132	.625	.623
中低以下	-.360****	.121	-.364	.119	.056	.569
中等以下	-.137	.108	-.116****	.107	.126	.434
中上以下	.103	.134	-.207	.126	-.176	.509
民族(汉族=1)	-.247*	.144	-.200	.140	.135	.685
宗教信仰						
三大宗教 v 民间宗教	-.784**	.370	-.755	.369	22.298	23721.187
有信仰 v 无信仰	.361*	.195	.337	.194	-10.828	11860.594
年龄						
青年 v 中年	-.207*	.111	-.156	.109	.393	.487
青、中年 v 老年	-.086	.102	-.124	.100	.980**	.438
性别(男=1)	.202**	.095	.166*	.093	-.688	.425
模型检验	$\chi^2=73.913^{****}$ df=21, N=2668		$\chi^2=71.363^{****}$ df=21, N=2665		$\chi^2=24.432$ df=20, N=208	

*p<0.1, **p<0.05, ***p<0.01, ****p<0.005, *****p<0.001

人、男性比女性更可能产生有阶级认知意识。

其次,在农民阶级意识形成的结构性模型中(见表 2),区域类型、地域类型、政治身份、收入水平、房产价值水平等几个变量有显著影响,其中东、中部地区相对于西部地区、平原相对于非平原地区、百姓相对于有党派的人、年收入低于 6000 元的以及房产价值在中低以下的,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农民阶级。在控制变量中,年龄对农民阶级意识无显著影响,而男性则比女性更可能形成农民阶级意识。

最后,从阶级行动意识的结构性模型来看,模型不具有解释力,由此说明,结构性变量并不能解释农民参与集体行动,而可能是由其它因素所影响的。

综合起来看,70.8%的农村居民形成“有阶级”认知意识,这与区域类型、教育、房产价值、民族及宗教信仰等结构性因素有着显著关系。64%的农村居民已经具有较清晰的农民阶级意识,如果将此作为衡量“自为阶级”的标准,那么,当代中国小农已经不能算是“自在阶级”,他们虽然没有大范围地联系和组织起来,但并不等于他们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境遇一无所知。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较一致的农民阶级意识,是因为他们存在于相同或相似的客观位置之中,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相吻合。也说明 2.3% 的农民形成阶级行动意识,与结构性因素并无显著联系。

既然阶级认知意识和农民阶级意识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阶级行动意识则不受结构性因素影响,那么建构性因素是否对这些阶级意识产生显著影响呢?从表 3 建构性模型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来看,

三个模型的检验都具有显著性,表明建构性变量对三个层次的阶级意识都具有一定解释力,即农村居民的阶级意识与他们的实践经历的建构有着显著关系。

首先,就“有阶级”认知而言,个人的经商经历、无干部经历对这一意识形成有显著正向作用。此外,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和性别也有明显的作用。

其次,在农民阶级意识中,经商经历、参军经历和阶层认同等三个变量的影响较为显著,其中,有经商经历者、认同为下层的具有农民阶级意识的可能性更高,而参军经历会降低农民阶级意识的形成概率。同样,年龄和性别对这一意识的形成也有显著影响。

最后,阶级行动意识的建构模型的解释力虽相对较低一些,但仍具有显著性,这说明建构性因素对农村居民阶级行动意识的产生有着显著作用。具体来看,个人在 5 年内是否遭遇不公待遇的经历大大提高形成阶级行动意识的概率,有过不公待遇经历的农民产生参与集体行动的概率是未经历不公待遇者的近 4.5 倍。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意识是在阶级斗争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意识实则为阶级行动意识。因此在这里,我们将其视为水平最高的阶级意识。比较表 2 和表 3 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结果,会发现结构模型不具有解释力,说明当前农村居民的阶级行动意识并不是由相对稳定的、客观的、结构性的因素所决定的,因而可以说阶级行动不是阶级结构决定的。相反,建构模型中的个人不公待遇则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某种意义上说,农民的阶级行动意识是在人们遭遇不公待遇的经历中

表 3 影响农村居民阶级意识的建构性因素(2006 CGSS)

	阶级认知模型		农民阶级意识模型		阶级行动意识模型	
	B	S.E.	B	S.E.	B	S.E.
常数项	.880****	.267	.711***	.264	-1.258	1.126
非农经历(有=1)	.109	.096	.006	.093	.002	.374
经商经历(有=1)	.333****	.089	.363****	.087	.077	.363
参军经历(有=1)	-.304	.218	-.501***	.210	-.132	.788
干部经历(有=1)	-.384**	.201	-.302	.200	-.034	.857
有无技术(无=1)	.016	.114	.066	.111	.017	.445
不公待遇(有=1)	.059	.134	-.050	.129	1.499****	.343
阶层认同						
上层 v 中层	.286	.314	.159	.311	-.204	1.475
中层以上 v 下层	.309	.164	.331**	.163	-.397	.769
年龄						
青年 v 中年	-.240**	.105	-.217**	.103	.187	.431
青、中年 v 老年	-.213**	.092	-.235***	.090	.829**	.373
性别(男=1)	.208***	.088	.147*	.086	-.229	.373
模型检验	$\chi^2=37.688$ ****		$\chi^2=42.919$ ****		$\chi^2=27.414$ ****	
	df=11, N=2985		df=11, N=2978		df=11, N=227	

*p<0.1, **p<0.05, ***p<0.01, ****p<0.005, *****p<0.001

逐渐建构起来的。所谓不公待遇,既包含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某种实践状态,同时也包含了人们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的主观感受,即相对剥夺感。

就当前中国农村的经验现实而言,农民的集体抗争或集体行动通常是偶发的或“突发事件”,犹如斯科特(J. Scott)所说的“意外事件”,因为农民的斗争如果是公开的,通常就不是集体的,如果是集体斗争,通常就不是公开的(斯科特,2007:294)。尽管农民在日常经验中对现实会有这样那样的冤屈(grievances)、抱怨(complaints)乃至纠纷,但这些不公的感受并不一定导致他们采取行动,更不会轻易引发集体行动。集体性的或有组织行动的产生,通常与特定的矛盾或纠纷过程有关。麦宜生(E. Michelson)的研究也显示,只有很少的农民会将自己的冤屈诉诸于官方正义系统(official justice system),也就是说只有少数人才会爬上“纠纷宝塔”之巅,对自己所遭遇的不公或冤屈采取行动。那些采取行动的人通常与政治联系密切,他们试图利用更高的权威或关系资源来获得公正(Michelson,2007)。但是,在进入官方正义系统后,他们与这一系统互动过程以及所得到的结果,可能是激发集体行动诱因的源泉。

因此,为政府所担忧的农民集体行动以及有组织的阶级行动,其实并非是由结构性因素所决定的,也不是农民用来解决不公、不满或冤屈的常规方式,而是他们在处理自己所遭遇的不公或纠纷实践中,以及在与权力的互动过程中,由特定的场域、情境和情绪所触动的,也就是在纠纷实践以及在相对剥夺感不断积累中建构起来的。

至于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或地位观特征,那么为何有97.7%的人将自己认同为中层以下的阶层位置呢?结构性因素和建构性因素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表4是以下中上三级阶层认同为因变量的有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由结构性和建构性变量构成的综合模型(模型1)具有显著性,说明用结构性和建构性因素来共同解释阶层认同观念的形成是有效的。具体来说,区域类型、地域类型、管理职位、收入水平、房产价值和宗教信仰等结构性变量的影响较为显著,建构性变量中只有个人的经商经历有显著影响,控制变量中的性别的作用也较为显著。

在没有引入建构性自变量的模型2中,模型拟合效果依然较好,表明用结构性变量能很好地解释农民阶层认同观念。由此看来,虽然“中层以下”阶层

认同观念是由结构性和建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相对来说,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更为突出。在结

表4 农村居民阶层认同的多元Logistic回归结果
(2006 CGSS)

	模型1		模型2	
	系数	标准差	系数	标准差
阶层1(=下层)	-.949**	.431	-.336	.266
阶层2(=中层以下)	2.064*****	.452	2.655*****	.300
区域类型1(=东部)	.502****	.161	.535*****	.160
区域类型2(=中部)	.058	.147	.153	.144
区域类型3(=西部)	0(a)	.	0(a)	.
地域类型	-.299**	.126	-.272**	.126
地域类型(=平原)	0(a)	.	0(a)	.
户口类型	-.112	.318	-.101	.314
户口类型(=农业)	0(a)	.	0(a)	.
职业类型	-.133	.286	-.015	.279
职业类型(=农业)	0(a)	.	0(a)	.
职务1(=乡镇干部)	.600**	.252	.588**	.249
职务2(=村干部)	-1.321	1.673	-1.180	1.631
职务3(=无职务)	0(a)	.	0(a)	.
教育水平1(=小学以下)	-.182	.185	-.200	.183
教育水平2(=初中)	-.016	.177	-.010	.176
教育水平3(=高中以上)	0(a)	.	0(a)	.
政治身份(=有党派)	.142	.206	.142	.198
政治身份(=百姓)	0(a)	.	0(a)	.
收入1(=低)	-1.279*****	.204	-1.312*****	.196
收入2(=中低)	-.945*****	.191	-.994*****	.185
收入3(=中等)	-.829*****	.179	-.875*****	.175
收入4(=中上)	-.504****	.176	-.527****	.173
收入5(=高)	0(a)	.	0(a)	.
房产1(=低)	-1.323*****	.180	-1.346*****	.178
房产2(=中低)	-.798*****	.166	-.825*****	.165
房产3(=中等)	-.605*****	.161	-.642*****	.160
房产4(=中上)	-.735*****	.154	-.748*****	.153
房产5(=高)	0(a)	.	0(a)	.
民族(=少数民族)	-.298	.184	-.283	.182
民族(=汉族)	0(a)	.	0(a)	.
宗教信仰1(=三大宗教)	.371**	.170	.377**	.169
宗教信仰2(=民间宗教)	-.406	.501	-.389	.496
宗教信仰3(=无信仰)	0(a)	.	0(a)	.
非农经历	-.162	.121	/	/
非农经历(=有)	0(a)	.	/	/
经商经历	-.501*****	.107	/	/
经商经历(=有)	0(a)	.	/	/
参军经历	.079	.291	/	/
参军经历(=有)	0(a)	.	/	/
村干部经历	0(a)	.	/	/
村干部经历(=有)	0(a)	.	/	/
掌握技术	.080	.138	/	/
掌握技术(=有)	0(a)	.	/	/
不公待遇	-.220	.161	/	/
不公待遇(=有)	0(a)	.	/	/
年龄	.033	.075	.073	.072
性别	-.477*****	.117	-.481*****	.113
模型拟合	-2log likelihood =2559***** Df=28		-2log likelihood =2313***** Df=23	

注:a为参照项。*p<0.1,**p<0.05,***p<0.01,****p<0.005,*****p<0.001

构性变量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非平原地区比平原地区、无管理职务比乡镇干部、收入水平和房产价值越低的农村居民,具有“中下层以下”和“中层以下”阶层认同观念的概率越高。而在建构性变量中,有经商经历的农民,产生“中层以下”阶层认同观念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就控制变量而言,农村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较低的阶层认同。

对经验分析的结果,我们或许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加以理解:首先,从区域、地域以及经济收入和财产等方面的差异在阶层认同中明显作用来看,农村居民主要依据他们的实际或结构性地位来进行阶层认同的。西部、非平原地区的农村,收入水平和房产价值较低者,由于他们的实际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因而更可能形成“中层以下”的阶层认同。其次,经济地位是农村居民进行阶层认同的非常重要维度。收入和财产地位因素的显著作用,表明经济方面的差异是人们进行不同阶层认同的重要原因。最后,个人实践经历似乎对阶层认同的作用较为有限,经商经历这一因素的作用可能也与个人经济地位有关,因为外出经商的农民相对来说经济状况一般较好,因而也就倾向于更高层级的认同。总的看来,农村居民的阶层认同基本上是他们实际社会经济地位的反映,实践经历对其建构性的作用并不大。

四、结论与讨论

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对客观阶级阶层地位的分析来揭示阶级阶层之间的差别;二是根据社会成员关于阶级阶层的主观意识来反映社会不平等。本文根据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考察了乡村居民的阶级意识和阶层认同意识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这里对农民的阶级阶层意识的分析,无意要将“农民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沈原,2008:163),而只是想把对主观意识的考量纳入到乡村社会不平等及“三农”问题分析之中,以调节客观结构分析的单一性和过于悲观的论调。这样一种分析策略,类似于 D.李(D. Lee)提到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中的“弱阶级理论”取向(D.李,2005:299)。

对农民的阶级阶层意识分析,主要提出了两个基本理论假设:一是阶级阶层意识是客观地位反映的结构决定论假设;二是阶级阶层意识是在日常实践中主观建构的组成部分的建构论假设。关于阶级意识与结构、行动或实践的关系,一直是阶级分析中理论纷争的焦点。在对两种相对的假设加以检验的

过程中,我们不止是要说明阶级阶层意识究竟是结构还是行动决定的,也不止是要验证阶级阶层意识既是客观结构也是主观建构的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通过经验分析来把握具体的阶级阶层意识及其特征与具体现实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分析中我们并未运用抽象的阶级意识,而是将其具体化为无阶级认知、农民阶级意识、阶级冲突意识和阶级行动意识四个层次。在这四个层次之间,既存在意识水平之差异,也包含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具体经验和观念。

通过选择与客观结构和建构行动较为相关的几个重要变量,并检验了它们与阶级阶层意识形成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尽管阶级是社会学用来分析社会不平等的抽象概念,但在乡村居民的生活中,阶级并不是“一个模糊的、附加的特征”(斯凯思,2005:91)。64%的居民明确将自己认同为农民阶级,45%的居民认识到不同地位群体间存在着利益的相互冲突性,也还有 2.3%的人以不同形式参与了集体行动,只有 30%的人没有意识到阶级的意义。而且在阶层认同方面,“中层以下”的阶层认同格局意味着他们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社会底层”的阶层意识。不过,农村居民的阶级阶层意识也未形成吉登斯式的结构化趋势(Giddens,1973)。

在阶级阶层意识形成的背后,经验的分析得出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关于意识与结构和建构之间关系的定律:较低层次的意识水平主要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而越是更高层次的意识水平,实践经历的建构性作用越大。这一经过检验的定律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关于结构与建构的二元对立或在其中寻求调和的一般观念的不确定性。虽然经验模型所选取的变量对测量结构和建构的有效性可能有一定局限性,但每个变量至少对相关经验给出了较为明确的解释。

就研究的现实启示而言,实证分析所揭示的农民阶级行动意识的形成主要是在纠纷实践中建构起来的结论,将有助于我们改变以往认为农村社会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的结构决定论观念,并将要求我们把日常经验和纠纷实践带到农村工作的中心,以及农村社会矛盾与集体行动的社会学分析的中心。

参考文献

- [1]Giddens, A.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ing House.
- [2]Goldthorpe, J. et al.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

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3] Michelson, E. 2007. 'Climbing the Dispute Pagoda: Grievances and Appeals to the Official Justice System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459-485.

[4] O'Brien, K.J. 2002.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China Journal*. 48:139-154.

[5] O'Brien, K.J. and Liangjia Li.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Parkin, F. 1971. *Class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Praeger.

[7] Szelenyi, I. 1983. *Urban Inequalities Under State Soc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Weakliem, D. 1993.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Political Change: Voting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in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1964 to 197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382-397.

[9] 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周以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

[10] 艾薇克、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日常生活中的故事》，陆益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11] 边燕杰、卢汉龙：《改革与社会经济不平等：上海市民地位观》，载边燕杰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12] 边燕杰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13]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 年版。

[14] 赖特：《阶级》刘磊、吕梁山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15] 李, D.：《“弱阶级理论”或强社会学？》，载 D. 李、B. 特纳编《关于阶级的冲突》，姜辉译，重庆出版社 2005 年版。

[16]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17] 李路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

[18] 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19] 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0 年版。

[20] 刘精明、李路路：《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北京〕《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3 期。

[2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

[22]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23] 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国家社会主义由再分配到市场》，载边燕杰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

[24] 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25] 斯凯思：《阶级》，雷玉琼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26] 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07 年版。

[27]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

[28] 徐嘉猷编：《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比较研究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 1994 年。

[29] 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有组织抗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报告 2003 年版。

[30] 张宛丽：《中国中间阶层研究报告》，载陆学艺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北京〕《中国人口科学》2004 年第 5 期。

[32] 周晓虹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责任编辑 方心清〕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Identity of Rural Residents: Structure or Construction — 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2006CGSS

Lu Yilong

Abstract: Based on data analysis of Chinese societ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re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factors of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identity of rural resi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nearly 30% of the subjects have no class cognition; 64% have class consciousness of farmers; 45%, class conflict consciousness; 2.3%, class action consciousness. Rural residents have "under-middle" class identity. 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low class consciousness reflects structural economic status while high consciousness is constructed in practical experience.

Keywords: rural residents; class consciousness; class identity; structure; construction